

戴复古诗集版本源流分析

王岚

戴复古（1168—?），字式之，号石屏，黄岩（今属浙江）人，世家南塘（今浙江温岭）。父敏，号东皋子，有诗名，早卒。复古笃志于诗，从林宪、徐似道游，又登陆游之门。中年成名，漫游江湖间近五十年，仅于理宗绍定五年（1232）任邵武教授（明嘉靖《邵武府志》卷四），年逾八十以布衣终。著《石屏诗集》十卷、《石屏词》一卷、《石屏新语》一卷等（见明嘉靖《太平县志》卷六、万历《黄岩县志》卷六等）。戴复古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中可与刘克庄匹敌、最有成就的诗人。其诗虽未能摆脱晚唐风习，但他推尊杜甫，有不少忧国忧民、反映现实的作品。诗笔清劲爽俊，自成一家，且为人谦和，全无江湖谒客诞傲之习。

生平与籍贯

戴复古生于孝宗乾道三年丁亥腊月（1168），经历了孝、光、宁、理宗四朝，约淳祐年间以八十高龄寿终。有关戴复古生卒，《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缺如，而其实在他本人诗集当中就有确凿的文字可以推断其生年，如：《石屏诗集》卷四^①《新年自唱自和》“圣朝开宝历，淳祐四年春。生自前丁亥，今逢两甲辰。黄粱一梦觉，青镜二毛新。七十八岁叟，乾坤有几人。”理宗淳祐四年甲辰为公元1244年，时戴复老年七十八，由此推出其出生于公元1167年，乃孝宗乾道三年，正为丁亥年，与“生自前丁亥”合；“今逢两甲辰”则指他经历过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及理宗淳祐四年两个甲辰年。又同书同卷《新岁书怀四首》，其一曰“衰年百病身，淳祐五年春”，其二则曰“七十九岁叟，时吟感寓诗”，淳祐五年为公元1245年，戴氏年七十九，亦可推出生年公元1167年。另外在其他宋人记载当中也能找到不少旁证，例：《石屏诗集》卷首宋吴子良《石屏诗后集序》作于淳祐三年六月，谓此时戴复古“行年七十七矣”，淳祐三年上推七十六年，戴氏生年正为公元1167年，又宋方岳《秋崖集》卷六《书戴式之诗卷》，谓“予生后三十二年，才此一识（石屏）”，方岳生于公元1199年，晚于戴氏32年，则戴氏当生于公元1167年，等等，不一而足。根据这些散见材料的记述，推断结果全然一致，可见确实可信。但是戴复古的生日又在腊月，有本集卷四《斗山子王深父作石屏记为老夫书其文甚佳采记中语作五诗致谢·其四》“梅花腊月春……谁道是生辰”及卷五《生朝对雪张子善有词为寿》“腊月雪三尺”为证，而乾道丁亥年之十二月实际已进入公元1168岁首，所以其生年当作公元1168年才算确切^②。至于提到戴复古寿逾八十，则有本集卷一《和郑润甫提举见寄》其二“痴生年八秩”，卷六《阅旧稿见乔丞相诗跋因成此诗》“年逾八十貂蝉贵”以及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二〇“寿至八十余”等等为据。

戴复古的籍贯有两种说法，一谓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一谓黄岩南塘（今属浙江温岭）人。宋人一般称戴氏为台州黄岩人，具体强调戴氏是南塘人的多见于晚出之书。《石屏诗集》卷首元贡师泰作于至正十八年（1358）的《重刊石屏先生诗叙》曰“先生生于黄岩之南塘”；清康熙吕留良、吴之振等《宋诗抄·石屏诗抄》“天台黄岩人，居南塘石屏山，因自号焉”；清嘉庆戚学标《台州外书》卷四戴复古传谓“黄岩人，世家南塘”；嘉庆宋世萃刻本《台州丛书甲集·石屏诗集》署名题“太平（旧隶黄岩）戴复古式之”；光绪《台州府

^① 按：本集卷数依《四部丛刊》续编本，下同。

^② 此条参张继定《对〈新发现的戴复古重要史料及其考证〉的几点辨正》，见《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页44。

志》卷八四《文苑传》引《康熙志》：“黄岩人，今隶太平”等等。黄岩的范围大，南塘的地域小，而且南塘原属黄岩县管辖，本无矛盾，只是明成化五年（1469）设县（治今浙江温岭），改隶太平，所以才致分歧，故《黄岩县志》也好，《太平县志》也好，都将戴复古当作本县本土的先贤立传，很好理解。

宋人编选戴诗

戴复古生活在南宋后期，当时一大群布衣诗人奔走江湖间，以诗篇干谒权贵，从而谋取衣食，形成一股风气，人称江湖派。但这个群体是自由松散的，戴复古即为其中一员，不过他身上却没有那种曲意奉承或妄加訾议等不良习气。与大多数江湖诗人一样，他浪迹江湖，足迹遍布东吴、浙西、襄汉、北淮及南越，几乎跑遍南宋全境。除名山大川灵洞珍苑拓其诗境、激其诗情外，他还在游历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名士、师友，如真德秀、严粲、严羽、楼钥等，与他们倾心结交，诗酒酬唱。而且当他八十高龄，其子戴琦从镇江将他迎回老家之后，他还常常终日携侄孙昺、槃、服等“探梅观鹤为诗酒之乐”（《台州外书》卷四）。这样他在中年成名、游历江湖近五十年的生涯中，诗作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

戴复古一生究竟写了多少诗作，他自己曾说过“平生五百篇”（本集卷一《祝二严》）。他的侄孙戴昺亦以诗名，曾著《东野农歌集》行世，他有一首诗《〈石屏后集〉钁梓敬呈屏翁》，其中提到“新刊后稿又千首，近日江湖谁有之？”（本集卷九附录《戴东野诗》）可见戴复古在最初的《石屏集》而外，又创作了千首诗歌，编刊为《石屏后集》。今本《石屏诗集》有十卷，除去前后附录他人诗作，尚有八卷诗词，共941首（《四部丛刊》续编本）。所以说戴复古创作甚丰，有千余首诗歌传世是可信的，这在同时的江湖诗人当中仅次于刘克庄（四千余首），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位。

宋人比较重视个人的创作，除了自己手编，有时还往往请了解自己的人代为编订，那么戴复古的诗作，最初是由谁来编集的呢？首先他本人自己肯定作过初步的排比，本集卷七《戏题诗稿》曰“冷淡篇章遇赏难，杜陵清瘦孟郊寒。黄金作纸珠排字，未必时人不喜看。”感叹知音难寻，但亦欲世人传看。后来当他步入晚境，曾经嘱托新结交的友人严粲、严羽为其收拾、编辑诗作，本集卷一《祝二严》谓“糊口走四方，白头无伴侣。前年得严粲，今年得严羽……我老归故山，残年能几许。平生五百篇，无人为之主。零落天地间，未必是尘土。再拜祝二严，为我收拾取。”戴复古四处云游，其妻在家劳作，抚育子女，后复古归而其妻已亡，见本集卷六《石屏久游湖海祖妣遂题二句于壁云机番白苎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后石屏归祖妣已亡矣续成一律》“……自古诗人皆浪迹，谁知贤妇有关心。归来却抱双雏哭，碑刻虽深恨更深。”（按：诗题当为戴复古侄孙辈所拟。）“白头无伴侣”指此，所以戴复古托二严为其编集是在他晚年丧妻之后；“平生五百篇”当是经过他自己筛选之后的诗作而不是全部的数量；“无人为之主”，说明除了他自己手编之外，还没有别人正式帮他整理编辑过。但是后来严粲、严羽是否接受戴复古的嘱托替他编集，集名为何，五百篇分作几卷，是否刊行等等，不得而知。

戴复古自编的诗稿也好，想托二严编订的五百篇也好，应当是收录较全的“全集”；而当时社会上还风行请名人（多为有较高鉴赏力的评家）选录为小集流传，借以扩大影响。戴复古创作丰富，诗友众多，诗名亦显，故此类选集编刊了有七八种之多。第一个为戴复古编订选集的是赵汝说，字蹈中，号懒庵，余杭（今属浙江）人，太宗八世孙，曾与兄汝谈上疏乞斩韩侂胄，坐废十年，后登宁宗嘉定元年（1208）进士。在赵汝说嘉定年间任“湘漕”^①

^① 按：湘漕即湖南转运使，《宋史》卷四一三作湖南提举常平。

时，戴复古认为他有“高鉴”，特地倾出平生所作让他选编。最后赵汝说选定 130 首，是为《石屏小集》，还请赵汝腾为此集作序。后赵汝说于嘉定十六年卒^①，其兄汝谈见到戴复古《题后》感慨不已，亦作题跋，且录藏一本而后归还给戴复古[《四部丛刊》续编本卷首嘉定十六年复古书、（嘉定）甲申（十七年）赵汝谈题跋、绍定二年（1229）赵汝腾《石屏诗序》]。赵汝说本人工诗，且“议论高绝一世，极靳于许可”（复古书），赵汝腾亦说汝说“于诗少许可”，唯独于戴复古诗选取 130 首之多，且兼备众体之精（本集卷首赵汝腾《石屏诗序》、倪祖义题跋），足见其欣赏之至。

继赵汝说编选《石屏小集》之后数年，戴复古在朋友劝说之下，又将自己的零散新作稍事汇集，复得四百多篇，交三山赵茂实（赵汝腾）、金华王元敬（王伋）两人删选。赵汝腾（？—1261）即绍定二年（1229）曾作《石屏诗序》者，字茂实，号庸斋，寓福州，后官居吏部尚书兼给事中。王伋，师王柏，官福建转运副使。赵、王二人各自按照自己的品味，分别选集了一编，合二人所选二帙，只有原稿的半数，即选录了二百来篇，但不知集名，很可能未曾付梓刊行[本集卷首嘉定十六年（1223）复古书]。

不久袁甫就赵、王所选二本，再在其中摘取百首，附于赵汝说编选之《石屏小集》之后，是为《续集》。从四百余首诗作中，反复摘选得百篇，可谓“精粹”之本矣，戴复古本人对此集中所选之作亦相当得意，自称“明珠纯玉，万口称好；无可拣择，是为至宝”[本集卷首绍定五年（1232）复古自书]。

章泉赵蕃乃戴复古诗友，他也为戴复古选过诗，但似乎是在赵汝说选本的基础之上再加精选，倪祖义说“懒庵为石屏戴式之摘取百余篇，兼备众体精矣。章泉所拈出则其尤精而汰者也”，甚至评说“爰式之诗者，读此足矣……回视旧编，遂成组绣”，似乎读此一编，便可将石屏诗概括尽净（本集卷首倪祖义题跋）。赵蕃还曾经评论陈师道《寄外舅郭大夫》通篇似杜诗，而戴复古《思家用陈韵》^②“湖海三年客”全篇似陈，却不入赵汝说所选《石屏小集》130 首之中，甚觉不妥（本集卷首赵蕃题跋）。可以想象，如果赵蕃也象赵汝说那样得到戴复古“平生所作”来加以选择的话，那么他的这个选本一定还能保留不少不见于《石屏小集》的戴诗佳作。

据明人记载，小山萧泰来学易又为戴复古编选了《第三稿》（本集卷尾明马金《书石屏诗集后》）。萧泰来，字学易，又字则阳、阳山，号小山，临江（治今江西樟树市西南）人，绍定二年（1229）进士，曾知隆兴府，官御史，有《小山集》。

石屏诗还有《第四稿》，为李贾、姚镛所选，李贾所刊。李贾，生平不详。姚镛，字希声，一字敬庵，号雪篷，剡溪（今浙江嵊县南）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著有《雪篷集》。戴复古与姚镛相差有二三十岁，当他已是六七十老翁时，与姚镛结成忘年之交，姚镛曾推崇道，“式之诗天然不费斧凿处，大似高三十五辈^③……晚唐诸子当让一头”[本集卷首绍定六年（1233）姚镛题跋]。当姚镛知赣州时因忤帅臣而谪衡阳（今属湖南），戴复古还特地翻山越岭前去拜望，并赠诗曰“寒入疏篷夜雪深，是非难辩口如喑。一官不幸有奇祸，万事但求无愧心。”（本集卷六《怀雪篷姚希声使君二首》其一）还热情地拿出自己的近作一编，让姚镛编选，“复俾铨次”。姚镛遂将诗作 60 首，编为《第四稿下》，时为理宗端平三年（1236）（本集卷首端平三年姚镛题跋）。

同年，戴复古结束对姚镛的探访南归，路过渝江尉舍，见到了另一位诗友李贾友山，便拿出姚镛刚刚所选的《四稿下卷》，李贾持卷吟诵不已，并且将此编全部付梓，“仆永歌不足，并入梓以全其璧”（本集卷首端平三年李贾题跋）。

如此看来，戴复古喜欢每过一段时期，便将自己积累的新作交友人编选流传。他在姚镛

^① 按：此条据嘉定十七年甲申赵汝谈题跋“而蹈中则下世逾年矣”推算。

^② 按：此诗不见本集，为集外佚诗。

^③ 即唐代著名诗人高适。

受权臣迫害遭到流放的逆境中，不避嫌忌，千里探访，还将自己极为珍视的诗作交其编选，足见其有蔑视权贵的侠肝义胆。姚镛所选，自称《第四稿下》，则还有《第四稿上》传世。明人认为是“李友山、姚希声选为《第四稿》上下卷”（本集卷尾明马金《书石屏诗集后》），或许有据；则《第四稿上卷》为李贾所编选，故姚镛在他选的《第四稿下》中，“且效李友山摘奇左方”（姚镛题跋），仍旧保留了李贾编选的体例；李贾见到了姚镛所选《四稿下卷》之后，“并入梓以全其璧”（李贾题跋），即将姚镛所选《第四稿下卷》与他自己所选《第四稿上卷》，合在一起付梓刊行。

戴复古选集还有《第五稿》上下二卷，此本不见宋人记载。明弘治十七年（1504）戴氏裔孙戴镛说“《石屏诗全集》，宋绍定间已板行”，后渐散逸，他当时还能见到其父天顺初手录的《小集》并《续集》，其兄检得刻本《后集第四稿》下卷并《第五稿》上下二卷，另外他本人还从其他藏书家处搜集得到律诗数十篇（本集卷尾弘治十七年戴镛题跋）。据此，则明人所见戴复古石屏诗尚有《第五稿》上下二卷刻本，但不知何人所选，何时所刊。另外也可知道姚镛所编选的《第四稿》下卷，其刻本全名为《后集第四稿》；则同时付刻的李贾所选《第四稿》上卷，亦当同名，可惜明时已经失传。

武林书商陈起编刊《中兴群公吟稿戊集》，今存残本七卷，其卷一至三即为“石屏戴式之”诗三卷。这也是一个戴诗选本，但没有专门的定名，它与同样是陈起辑刊的《南宋六十家小集》中所收袁甫编选的《石屏续集》四卷是两个不同的选本。

以上所述皆为宋人选本，编选戴石屏诗至五稿之多。此外，宋人还喜摘句，摘录警联，汇以成册。巩丰（1148—1217），字仲至，号粟斋，武义（今属浙江）人，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尝知临安县，工诗，有《东平集》二十七卷。戴复古游历经过“武川村舍”，登门拜访，并于袖间拿出近作一编，款谈终日。巩丰挑灯夜读，意犹未尽，最后还为其摘句。时为嘉定七年（1214），约与赵汝说为戴复古编选《石屏小集》同时（本集卷首嘉定七年巩丰题跋）。

戴复古诗在他生前编就的集子就有数种，有全集，但更多的是选集，那么它们是否都曾刊刻流传呢？赵汝说编订《石屏小集》130首在宁宗嘉定年间，就《石屏小集》流传甚广，被许多人称引的情形来看，估计有刻本传世。

戴复古“石屏诗全集”（未必是原名），据明人记载，在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曾经板行[本集卷尾弘治十七年（1504）戴镛题跋]，但不明卷数以及收诗情况。本集卷六有一首诗《谢吴秘丞作石屏集后序》，此处戴复古请人品题的《石屏集》也许就是这个本子。

同样是在绍定时（五年，1232），袁甫又精选了《石屏续集》100首（本集卷首绍定五年复古自书），今天尚完整收录在与戴复古同时的著名武林书商、选家兼江湖诗人陈起所编刊的《南宋六十家小集》以及（旧题）陈思（同时稍后的武林书商）编、元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二七三至二七六）当中^①，可见《续集》当时的刊本远不止一个，在社会上影响相当广泛。

有关萧泰来所选《第三稿》，记载较少；但就《第四稿》、《第五稿》承继其后，并且都见刻板来看，《第三稿》想必也有刻本。

至于《第四稿》，全名应当是《后集第四稿》，上卷由李贾所选，下卷60首为姚镛所选，两者并由李贾刊于“渝江尉舍”，时间是在端平三年（1236）。

石屏诗《第五稿》上下二卷，材料阙如，仅明中叶人见过刻本[本集卷尾弘治十七年（1504）戴镛题跋]，这个刻本也许是宋刻原本，也许是元、明人的翻刻本，未详。

前面曾经提到过戴复古侄孙戴昂写过一首《〈石屏后集〉钁梓敬呈屏翁》诗，这个《石屏后集》与姚镛所选《后集第四稿》下卷，名称相合，但姚镛仅选诗60首，而戴昂说“新

^① 按：二本所收诗数、编次全同，详后。

刊后稿又千首”，数量相差悬殊，所以似乎可以如此推测，除了《石屏小集》、《续集》之外，《第三稿》到《第五稿》都属于“后集”，合三、四、五稿总和也许能够接近千首之数。那么《第五稿》二卷也是宋人所编选，而且三、四、五稿的编刊均在戴复古晚年告成，即《石屏后集》的刊刻不会晚于理宗淳祐年间^①。今本《石屏诗集》卷首尚附录有宋吴子良《石屏诗后集序》，作于淳祐三年（1243），则《后集》又称《石屏诗后集》，淳祐三年之前已经编成。

《中兴群公吟稿戊集·石屏戴式之》诗三卷，其编选与刊刻都是陈起所为。陈起（？—1256），字宗之，号芸居，其书肆位于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是当时江湖诗人的活动中心。他于理宗宝庆元年（1225）刊刻《江湖集》，忤权相史弥远，引发一场“江湖诗祸”。后《江湖集》被劈板，陈起遭流配，晚年方遇赦还乡。故此戴诗三卷的编刊当在宝庆元年之前。

另外，在戴复古游历江湖过程中，还遇到过热情款待并想为他刊刻石屏诗集的大官，如本集卷六有一首诗《见淮东制帅赵南仲侍郎相待厚甚特送买山钱又欲刊石屏诗置于扬州郡斋话别叙谢》。赵南仲即赵葵（1186—1266），号信庵，一号庸斋，衡山（今属湖南）人，历两淮宣抚使判扬州，仕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善画、工诗，《宋史》卷四一七有传。但看来当时赵葵只是提出过建议，其实《石屏诗集》的“扬州郡斋刊本”最后并未产生。明马金在其弘治十一年（1498）所撰《书石屏诗后集》中提到的“又有欲以其诗进御而刊置郡斋者”，与此情形类似。

由于戴复古生活时代已接近南宋尾声^②，其著作连与他同时稍后的陈振孙（1183—1249）所撰《直斋书录解題》当中都没有著录，亦不见元人所修《宋史·艺文志》，所以戴复古诗集在宋代可考知的刻本以及有可能存在的刻本就只有上述这些了。

宋以后的流传

一、全集

戴复古石屏诗全集，宋绍定刻本已无传，至元代末年又有新刻。戴氏裔孙戴文瓚校订旧本，重新刊刻于“天台”^③，集名为《重刊石屏先生诗》，并请贡师泰作序，时为至正戊戌（十八年，1358）（本集卷首至正十八年贡师泰《重刊石屏先生诗叙》）。但是这个元末刊本《石屏先生诗》，收录几卷不详，而且似乎在当时反响不大，不久便失传了。

明、清两代，戴复古诗全集则有不少重要的本子流传。

a、明弘治马金刻本（简称弘治本）

传今的石屏诗全集，最早的刻本出于明弘治年间。有感于宋本湮灭、家本散亡，戴氏子孙开始着意搜求，天顺初十世孙戴镛之父戴恬隐（名琰，字尚重）手抄《石屏小集》并《续集》合为一部；戴镛之兄戴潜勉（名通，字允儒）又检得《后集第四稿》下卷并《第五稿》上下二卷；戴镛亦从其他藏书家处搜集得到戴复古律诗数十篇，然后将这些旧稿全部交给儿子戴豪，进京复求其他完本，时为成化己亥（十五年，1479）。后戴豪出任广东参政，又从《南塘遗翰》中抄得戴昺诸人诗章若干，想将它们附录在《石屏集》之后，一并刊刻，可惜不久即卒于官。戴镛本人后来做了庐州六安县学正，久欲将《石屏诗集》付梓但力不能逮，遂向州倅（庐州府同知）马金（字汝砺）求助。马金曾于成化年间手录过一翰林院写本石屏诗，讹舛甚多；得戴镛搜集之本后，便亲自校勘二本，并重加编次。历经四年，最后编成十

^① 按：戴复古约卒于淳祐末年。

^② 按：淳祐末年距南宋灭亡仅不到三十年。

^③ 按：此处实指台州。台州境内有天台山，戴复古就常自称天台人。

卷，马金请庐州守宋鉴（字克明）出面，正式刊刻于郡斋，不到一月即告刊成，时为弘治十年（1497）。第二年，马金还撰写了一篇《书石屏诗集后》（以上本集卷首弘治十年谢铎《重刊石屏诗集序》及卷尾弘治十一年马金《书石屏诗集后》、弘治十七年戴鏞题跋）。正德二年（1507）时，戴鏞早已升为南京国子监监丞，宋鉴、马金亦都调职离任，戴鏞便禀请掌监事黄少宰，将庐州郡斋《石屏诗集》书板，移藏于南京国子监东书楼保存（本集卷尾正德二年戴鏞题跋）。

弘治十年（1497）宋鉴、马金庐州刊本《石屏诗集》，十卷，卷首录戴鏞之父东皋子戴敏诗 10 首，末二卷乃附录戴复古裔孙宋戴东野（昺）以下明戴鏞之兄戴潜勉（通）等 28 人诗作。明刻原本尚有 5 种传本，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均有收藏。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涵芬楼据常熟铁琴铜剑楼藏本^①影印收入《四部丛刊》续编的《石屏诗集》，就是明弘治本。

《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石屏诗集》卷首及卷尾附录极多，尤其是宋人所撰序记题跋等更是搜罗殆尽，但并不按照年月先后排次。卷首录有元至正十八年（1358）贡师泰《重刊石屏先生诗叙》、明弘治十年（1497）谢铎《重刊石屏诗集序》、宋绍定二年（1229）赵汝腾《石屏诗集序》、淳祐三年（1243）吴子良《石屏诗后集序》、嘉定三年（1210）楼钥序、淳祐二年包恢序以及诸多宋人题跋，如端平元年（1234）赵以夫、甲申^②赵汝谈、嘉定七年真德秀、端平元年王野、某年倪祖义、某年赵蕃、绍定六年姚鏞、端平三年李贾、嘉定七年巩丰、甲戌（嘉定七年）杨汝明、端平三年姚鏞；又录《归田诗话》、《松石轩诗评》以及曾极、李贾、李义山、赵希迈、林璧等人《题式之诗卷后》诸诗；还有戴氏所题嘉定十六年“复古书”及绍定五年“复古自书”两道。序记题跋之后是戴复古之父戴敏所作《东皋子诗》，题署为“黄岩戴敏敏才”，无目录，正文半页 9 行行 17 字，仅有《小园》等 10 首诗，单独成卷，后有“复古忍泣敬书”、淳祐四年陈昉题跋、淳祐四年赵以夫题跋、宝庆三年（1227）倪祖义题跋等数道，叙述了早年丧父的戴复古，搜访其父传世遗诗仅得 10 首，晚年时特地表录于其《石屏诗稿》之前的经过原委。

卷首附录完毕，这才出现《石屏诗集目录》，前有题名 8 行“天台戴复古式之诗，浚仪赵汝铛（当作说）蹈中、剡中姚鏞希声、四明袁甫广微、小山萧泰来学易、昭武李贾友山选，阳城宋鉴克明重刊，西充马金汝砺重编”；次有诗数总计，“近古体九十□首、五言律四百十□首、七言律二百十□首、绝句一百三十□首、词二十五首，共八百九十□首”。按：实际统计数为近古体 73 题、98 首，五言律 367 题、466 首，七言律 202 题、219 首，绝句 88 题、133 首，词 15 题、25 首，共 745 题、941 首。然后是各卷分体细目，卷一近古体，卷二至五皆为五言律，卷六为七言律，卷七绝句，卷八词，卷九附录戴东野（昺）诗 104 首（实为 105 题、132 首），卷一〇附录戴渔村（木）至戴潜勉（通）诗（计 27 人，88 题、104 首）。目录之后入正文，半页 9 行行 19 字，黑口，书口中间题“石屏诗集卷第一”，下题页码。卷一至八皆为戴复古所作诗及词，卷九为在戴复古晚年归家之后经常陪侍其赏乐酬唱的侄孙戴昺诗，卷一〇为戴复古侄孙戴木直至明成化、弘治时十世孙戴通诸人诗。每人名下皆有 小字传文以及个别相关题跋等。

《石屏诗集》十卷之后，又有附录题记：明弘治十一年（1498）马金《书石屏诗集后》、弘治十七年戴鏞题跋、正德二年（1507）戴鏞题跋；另外还有清人黄丕烈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过录的他本人从前题写于所藏明刻残本八卷上的嘉庆七年及十九年题跋两道。

由此可见，明弘治十年（1497）刻本以戴复古十世孙戴鏞所搜集的几种戴复古选集的抄本（《小集》、《续集》）、刻本（《后集第四稿》下卷、《第五稿》上下二卷）以及佚诗为底本，由庐州倅马金据一抄本校勘，重加编次，交庐州守宋鉴刊刻于庐州郡斋，但是刊本

^① 按：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② 按：赵汝谈卒于理宗嘉熙元年（1237），故此处甲申当为宁宗嘉定十年。

题名中却抹去了戴鏞的名字。其次，该本文字经过校订，所收近千首诗词按照各自的体裁作了重新的分卷编次，即将各种宋人选本合编，去其重复，按体归类，重新编卷。这个工作是由马金负责完成的，历时四年之久，校订工作还是比较可靠的。马金保留了戴复古将其父戴敏《东臯子诗》表于石屏诗前的旧式；至于戴昺、戴木等人的诗作，最初是十一世孙戴豪从《南塘遗翰》中摘出的，马金将它们编成卷九、卷一〇，附载于戴复古八卷诗词之后，尊重了戴氏后裔的意愿。第三，此本付梓“不阅月而功以告成”（明弘治十年谢铎《重刊石屏诗集序》），可谓神速，但刊刻质量就受影响，从其卷首、卷尾附录如此众多的序记题跋，却又杂乱无章未作整饬来看，既有尊重前人、保存史料的一面，但也实在难免后人粗疏之讥。

另外，马金在其《书石屏诗集后》中曾考“晦庵先生《答仲至书》有云‘黄岩老过访，惠诗一篇甚佳，亦见其刊行《小集》冠以诚斋之诗’。黄岩老盖指翁也，《小集》疑即蹈中所选者。夫以投赠大儒之诗得经题品而集中不载，非独散轶为可恨，而窃重有感焉”。按：马金所引朱熹之文见《晦庵集》卷六四《答巩仲至丰书·其六》，但朱熹（1130—1200）长戴复古37岁，当他去世之时戴复古年仅33岁，故其所称“黄岩老”当另有其人，而非非戴复古。杨万里《诚斋诗话》称：“自隆兴以来以诗名者，林谦之（光朝）、范致能（成大）、陆务观（游）、尤延之（袤）、萧东夫（德藻），近时后进有张鎡功父、赵蕃昌父、刘翰武子、黄景说岩老、徐似道渊子、项安世平甫、巩丰仲至、姜夔尧章、徐贺恭仲、汪经仲权。”其中黄景说，字岩老，号白石，与姜夔合称“双白石”。“黄岩老”当即此人。那么有杨万里诗冠首之《小集》亦非赵汝说所选《石屏小集》，此“黄岩老”赠朱熹之诗不见于《石屏诗集》是肯定无疑的，所以马金大可不必为此憾恨。

b、明万历潘是仁刻本（简称潘刻本）

明刻本中又有《石屏诗集》六卷，为明万历时潘是仁所刊，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此本卷首有潘是仁所撰《戴石屏先生小序》，言“是集得之于贺氏家藏旧本”。次为石屏诗集目录，第一卷五言古诗（按：计34题、57首），第二卷七言古诗（计28题、29首），第三卷五言律诗（计163题、195首），第四卷七言律诗（计78题、82首），第五卷五言绝句（计4题、6首）、六言诗（计1题、2首），第六卷七言绝句（计65题、66首）。目录后为正文，标题为“石屏诗集”而不标“卷一”字样，有题名两行“宋戴复古式之甫著，明潘是仁切叔甫辑校”（每卷皆有），正文半页9行行19字，书口上端题“石屏五言古”，中题卷数、页码，以及刻工姓氏“梅”等。卷六之后无任何序记题跋。按：此本收录戴复古诗六卷，基本上是一体一卷，总计363题、437首，与弘治本（a）745题、941首相比，仅得一半之数，而且分卷也不相同，显然是另外的选本，是潘是仁以贺氏家藏旧本为底本，重新辑校编刊而成。它与弘治本的异同将在后面作详细比较。

潘是仁，字切叔，明万历时人，事迹缺如，但他编刻过多种宋元诗歌总集，如他曾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编选刊刻过《宋元诗四十二种》、《宋元四十三家集》等，其中《宋元诗四十二种》就收有戴复古的《石屏诗集》六卷。《宋元诗四十二种》，明万历四十三年自刻，后天启二年（1622）重修时增为“六十一一种”。此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皆有藏，核其《石屏诗集》内容文字，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石屏诗集》六卷完全一致，则二者的区别仅在于一为丛书本、一为单行本而已。

台湾“国家图书馆”收藏两部明刊本《石屏诗集》二卷、附《东臯子诗》一卷，半页9行行19字，四周双边，粗黑口，双黑鱼尾。卷首保留赵汝腾等诸宋人序；次为总目，题“天台戴复古式之诗，浚仪赵汝铛（当作说）蹈行（当作中）、剡中姚鏞希声、四明袁甫广微、小山萧泰来学易、昭武李贾友山选”。正文分上、下两卷，卷上取自十卷本卷一至三，卷下取自十卷本卷四至八（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按：此本系十卷本改编而成，但因未见原本，不知其收录数量多寡，故难断是属全本亦或选本，姑置于此。

c、明祁承口淡生堂抄本

除刻本外，明代的抄本今尚有存者。《石屏诗集》八卷、附录二卷、《东皋子诗》一卷，明祁承㮘淡生堂抄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卷首有“淡生堂经籍印”、“旷翁之识”等印；《石屏诗集目录》下有“天台戴复古式之诗……阳城宋鉴克明重刊、西充马金汝砺重编”8行题名，正文半页10行行20字，为淡蓝界格，书口上端题“石屏诗集”，中间题页码，下端有“淡生堂抄本”字样。书凡4册，每册页码各为起讫，而不按分卷标页。卷八后附录戴东野诗等二卷，行款变为半页10行行19字。按：此本虽然题为“《石屏诗集》八卷、附录二卷、《东皋子诗》一卷”，但实际所收与弘治本《石屏诗集》十卷相同；其卷首、卷尾所附录的各篇序记、题跋，皆见弘治本，且次序未易；还有分体编卷、序次、收诗数量等等与弘治本毫无二致；更有“宋鉴克明重刊、马金汝砺重编”题名，皆可证此淡生堂抄本的底本即为弘治本无疑，且抄本较忠实地保留了底本原貌。祁承㮘（1565—1628），字尔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历江西右参政，好藏书、校书，著《淡生堂集》。其抄本年代当与潘是仁刻本同时。

进入清代，《石屏诗集》十卷有不少抄本流传。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刘氏嘉荫簃抄本，有“嘉荫簃藏书印”、“刘喜海印”、“结一庐藏书印”等印记，半页8行行24字，字迹端正，所用蓝格印纸为四周双边，每页书口不题书名卷页，而在下方均印“东武榴氏嘉荫簃抄书”字样。该本卷首有元贡师泰序，《目录》下有“……阳城宋鉴克明重刊，西充马金汝砺重编”题名，末有明马金跋，显然是据弘治本抄录，但较弘治本少卷首明谢铎序以及卷末明戴铺题跋。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一旧抄残本（存卷一至三），有“朱印彝尊”、“谦牧堂藏书印”、“得一步想书屋”、“木犀轩藏书”等藏印，虽然残缺，但卷首诸序记、题跋、东皋子诗、目录、题名以及正文三卷却完好无损，较之弘治本无异，亦是据之抄录。

另外，又有红叶山房抄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广东、南京图书馆也各有一清抄本，估计它们亦都出自明弘治本。

d、清乾隆《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

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据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收录《石屏诗集》六卷，它与明潘是仁刻本（b）书名卷数相合，是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呢？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首尾没有保留任何一篇前人序记或题跋，起首即为石屏诗集目录（乃总目，不含细目）：卷首东皋子诗，卷一近古体；卷二至四，五言律；卷六绝句、词。正文标题“石屏诗集卷首，宋戴敏撰，东皋子诗”，录诗10首，后无戴复古等人题跋，与弘治本不同。然后是“石屏诗集卷一，宋戴复古撰，古体”。细核该本各卷所录各体诗，卷首东皋子诗及卷一与弘治本同；卷二止于《辛丑岁暮三首》，卷三起于《小畦》，而弘治本卷三起于《岁旦族党会拜》，其前四题（五首）至《小畦》仍属卷二；卷四相当于弘治本卷四、五两卷；卷五相当于弘治本卷六；卷六相当于弘治本卷七、八；无弘治本卷九、一〇所附录戴东野等人诗。该本所收录的诗词数量及编排次序除个别地方外与弘治本基本相同。

可是拿该本与明潘刻本相较又如何呢？前已述潘刻本与弘治本编卷不同，录诗仅得弘治本半数，诗次与弘治本完全相错，是明万历时潘是仁重新编校的一个选本，所以该本与潘刻本虽然书名卷数相同，但实际内容差异甚大，完全不是互有直接关联的本子。而清人却存在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这两个六卷本《石屏诗集》是同一本子。清光绪《台州府志》卷四五《经籍考十二》“明潘是仁《宋元名家诗集》中有《石屏集》六卷，今四库据鲍士恭藏本著录凡六卷，盖即《宋元名家集》本也”。显然是未将二本详作比较而得出的主观臆断之辞。这个说法后来还以讹传讹，为不少人所接受，如《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即在“《石屏诗集》六卷”目下著录了“宋元诗六十一种、四库全书”两个版本，却与另一“《石屏诗集》

六卷，明藩（当作潘）氏刻本”隔开距离；又如金芝山点校《戴复古诗集》在书后附录中转载了《台州府志》材料，而且所选参校本中仅有四库本，而无潘刻本，大概也认为二本相同吧。所以在这里很有必要加以澄清，潘刻本与四库本虽然都是《石屏诗集》六卷，却完全是属于不同系统的本子。

e、清嘉庆宋世莘《台州丛书》本

除抄本外，清代也有新刻本，《石屏诗集》十卷，嘉庆丁丑二十二年（1817）宋世莘刻本，收入《台州丛书甲集》。此本内封有牌记一块“台州丛书甲集之一，石屏集，临海宋氏开雕”，卷首有陕西扶风知县宋世莘嘉庆丁丑新撰《重刊石屏集序》。宋世莘是临海（今属浙江）人，戴复古是黄岩人，同属台州。嘉庆二十一年宋世莘得到“长塘鲍生正字”（鲍廷博之孙）所寄抄本，遂予付梓。宋氏序中说“集为明弘治间石屏裔孙学正鏞所刻”，且刻本中保留有“天台戴复古式之诗……西城宋鉴克明重刊、西充马金汝砺重编”题名8行，所以他得到的底本是抄自明弘治本。但是宋氏新刻本与弘治本稍有差异：首先，卷首附录前人诸篇旧序中少元贡师泰《重刊石屏先生诗叙》1篇；其次，卷首《东皋子诗》，署名作“黄岩（原注：今隶太平。）戴敏敏才著”；正文“石屏诗集卷第一”下署名作“太平（原注：旧隶黄岩。）戴复古式之”；半页10行行21字，书口上端题“石屏集”，中间题卷数、页码，下端题“临海宋氏重梓”；卷一终有“临海宋兴洲校字”一行（按：每卷皆有，校字人名不同）。第三，卷末题跋少戴鏞、黄丕烈两人。可见宋氏刊本虽然源于弘治本，但是已重新作过文字校勘，对底本（弘治本之传抄本）有过一些改动。

二、选本

以上所述为宋以后石屏诗全集的传本情况，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宋人编选的石屏诗，名目繁多，当时都是各集单行，但后来大多亡佚了，只有少数几种还完整保留到了今天，即《中兴群公吟稿戊集·石屏戴式之》三卷，以及袁甫编选的《石屏续集》四卷。

f、《南宋群贤小集·中兴群公吟稿戊集·石屏戴式之（诗）》（简称吟稿本）

《南宋群贤小集·中兴群公吟稿戊集》为宋陈起所辑，今存残本七卷，其中卷一至三所收“石屏戴式之”诗三卷，见清嘉庆六年（1801）石门顾修读画斋重辑《南宋群贤小集》刊本后附。该本卷一收《梦中亦役役》等古体15题、20首，绝句27题、28首，分别见于弘治本卷一、卷七；卷二收《秋怀》等五言律45题、45首，分别见于弘治本卷二、四、五、三；卷三收《江滨晓步》等七言律51题、53首，见于弘治本卷六。总计138题、146首诗，其中有12首诗不见于弘治本，且三卷之中诗篇排列次序与弘治全然不同。

g、《两宋名贤小集》、《南宋六十家小集》、《南宋群贤小集》之《石屏续集》（分别简称名贤本、六十家本、群贤本）

宋袁甫所编《石屏续集》四卷，在当时流传甚广，今天大陆尚存有两种清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台湾还收藏有影抄宋临安陈氏书籍铺刊本，并《长短句》一卷，半页10行行18字，上有清黄丕烈手跋（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

另外还流行数种丛书本，如清抄本《宋人小集五十五种》、《宋人小集六十八种》、《宋人小集三十二种》等等。还有3种丛书是宋人旧辑：一为（旧题）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本（见其卷二七三至二七六）（名贤本）；一为宋陈起辑《南宋六十家小集》本（六十家本）；另一即前面提到的同样是宋陈起所辑的《南宋群贤小集》，它既附了《中兴群公吟稿戊集·石屏戴式之》诗三卷（吟稿本），又别有《石屏续集》四卷，我们把这个四卷的本子称为群贤本。名贤本最早的是一旧抄本，后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六十家本最早的有明汲古阁影宋抄本（1921年上海古书流通处据群碧楼藏本影印）；群贤本则有清嘉庆六年（1801）石门顾修读画斋重辑刊本。三本卷一收《客行河水东》等古体25题、36首，

见弘治本卷一；卷二收《饮中》等七言律 18 题、18 首，见弘治本卷六；卷三收《九日》等五言律 22 题、23 首，见弘治本卷四、五、三；卷四收《楼上观山》等绝句 25 题、32 首，见弘治本卷七。总计 90 题、109 首，其中有 15 首诗为弘治本所缺如，且四卷内诗次亦与弘治本迥异。这里有个疑问，我们已经知道明弘治本底本是由戴鏞提供的，其中就有其父戴琏手录的《续集》，后来跟其他搜集到的戴集选本、佚诗一起交给马金整理重编，所以编次打乱是肯定的，但是弘治本既然包括了《续集》，就不应当有本见于《续集》的集外之诗。难道是马金重新按体排比诗篇时疏漏所致？暂且存疑。至于名贤、六十家、群贤三本，所收录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名贤本卷一起首多了一则戴复古小传，当是编辑丛书者所撰。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石屏续集》四卷传今 3 本：名贤、六十家、群贤本仅仅是版本不同，内容并无差异；虽然《两宋名贤小集》、《南宋六十家小集》与《南宋群贤小集》3 种丛书都未标明《石屏续集》编者姓名，但我们亦可以根据旧籍记载判断它们就是宋代袁甫于绍定五年（1232）编选的附于《石屏小集》之后的《石屏续集》。《戴复古自书》曾说袁甫摘选其诗“百首”，核今本《石屏续集》实为 90 题、109 首，戴氏当是约而言之。

而《中兴群公吟稿戊集·石屏戴式之》诗三卷（吟稿本），就与名贤、六十家、群贤本不同了，它应当是陈起所编选的另一个戴诗选本。它收诗 138 题、146 首，较《石屏续集》为多，但也不能包括《石屏续集》的所有选诗；编卷及诗次亦与名贤、六十家、群贤本相异；有时还有同题不同诗的现象，如《溪上》（七绝）、《山村》（五律），显然是对组诗作了不同的选录的结果。另外与弘治本相较，它有 12 首佚诗不见于弘治本，而其中 5 首也为名贤、六十家、群贤本所选。而《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只记录了《南宋群贤小集》所收录的《石屏续集》四卷（群贤本），却遗漏了它的另一个重要本子，即《中兴群公吟稿戊集·石屏戴式之》诗三卷（吟稿本）。

另外，清人还有戴复古诗新的选本，如《宋诗抄·石屏诗抄》一卷、《宋诗抄补·石屏集补抄》一卷、《宋代五十六家诗集·石屏诗集》一卷，所选诗皆不出弘治本范围。

戴复古以诗名家，文章不显，流传下来的只有他所作几则短短的题跋而已。不过，新发现了戴复古佚文 1 篇，即 1971 年温岭出土的戴复古为族侄戴丁妻所撰《宋故淑妇孺人毛氏墓志铭》^①。但是他的词也写得不错，宋时就有《石屏长短句》一卷传世，陈起所辑《南宋六十家小集》在《石屏续集》之后就附收了此集；明毛晋辑《宋名家词》第四集以及《四库全书》等皆收有《石屏词》一卷，流传亦相当普遍。

戴复古诗，全集也好，选本也罢，重要的传本就是上述这些。概括说来，明弘治刻本十卷是传今最早的刻本，它不同于宋人旧刻，是戴鏞搜辑遗逸、马金重加校编的全集新本；后来续出的明淡生堂抄本即抄自弘治本，而清嘉庆宋氏《台州丛书》本也是以弘治本为底本的，所以弘治本无疑是《石屏诗集》十卷本系统的祖本。《石屏诗集》六卷有两个重要的本子，一是明潘是仁刻本，一是清《四库全书》本；前者实是潘氏新编的选本，而后者与弘治本比较接近，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系统的本子。至于《中兴群公吟稿戊集·石屏戴式之》诗三卷（吟稿本）与《石屏续集》四卷（名贤、六十家、群贤本）因是宋人旧编，所以显得比较珍贵，它们虽然只是百余首诗的选本，但却有许多补足弘治本的地方。下面将以弘治本为中心，对这几个重要的传本集中作一些横向的比较，以判断各本的异同与优劣。

诸本比较

一、弘治本与潘刻本

^① 见吴茂云《戴复古全集校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年，页 311。

1、分卷、收诗数量及序次不同：

弘治本卷一“近古体”《湖北上吴胜之运使有感而言非诗也》等 10 题潘刻本无；而《题姚雪篷使君所藏苏野塘画》等 26 题潘刻本总为卷二，排次同。

弘治本卷二“五言律”卷首《秋怀》以下 7 题以及卷尾《一冬无雨雪而有雷》以上 66 题潘刻本皆无；而卷中《清明感伤》至《黄道士出爻》等 46 题潘刻本收在卷三中，序次一样。

弘治本卷三“五言律”卷中《侄孙景文多女贺其得雄》等 21 题潘刻本无，其余各诗潘刻本收在卷三卷首。

弘治本卷四“五言律”《夜吟呈赵东岩》等 40 题，潘刻本收在卷三卷末，且诗次较弘治本全部错乱，其余各诗则不见于潘刻本。

弘治本卷五“五言律”整卷诗皆不见于潘刻本。

弘治本卷六“七言律”卷中《寄寻梅》等 128 题潘刻本无；其余各诗潘刻本收在卷四，序次同弘治本。

弘治本卷七《腊梅二首》等五题“五言绝句、六言诗”全见潘刻本卷五；“七言律”《访友人家即事》等 18 题潘刻本无，其余各诗潘刻本收在卷六。

2、弘治本为同题组诗，而潘刻本仅选录其一：

弘治本卷四《新岁书怀四首》，潘刻本无“四首”二字，且仅录其一；《侄孙亦龙作亭于小山之上口余以野亭名之得诗五首》，潘刻本作“二首”，仅录其一、其二；《又送行二首》，潘刻本无“二首”字样，仅录其一。

3、弘治本诗注、原校，有多处不见于潘刻本：

例：弘治本卷二《望花山张老家》诗末自注：“一老姬逢人必大哭云，我儿在谢陵不归也。光州有谢陵桥，其子与虏战死于此”。卷四《得古梅两枝》题下原校“一作雪川刘口家古梅”，诗末又有原校“一作连朝看不足，政要看花迟”；《访古田刘无兢》题注“潜夫宰建阳有声，人言自有建阳无此宰”等等，潘刻本皆无。

4、经校对潘刻本六卷文字，其异文、缺字多同弘治本；但偶有弘治本缺字、潘刻本可补者：

弘治本卷四《寄镇江王子文总卿》末联“北人向南望，□□月分明”，缺字他本无补，而潘刻本作江净。

由此看来，潘刻本肯定是个选本，但录诗接近全集半数；它重新编卷，基本是一体一卷；所录诗序次大多同于弘治本，但也有完全打乱的情况，如卷四之 40 题。它选诗入集时，对原本小字注语、校记，有时照录，有时删落，比较随意。它在文字上与弘治本接近。故而我们推测潘刻本不是直接根据弘治本来编选的，不过与弘治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也许潘是仁所得贺氏家藏旧本就是辗转出自弘治本的。但是它作为一个新出的明人选本，尽管编校质量不高，因与弘治本有较大差异，还应当视为新出的自成系统的刻本。

二、弘治本与四库本

1、编卷分合不同、收录数量与序次小异：

弘治本卷二见四库本卷二、三；弘治本卷四、五见四库本卷四；弘治本卷六相当于四库本卷五；弘治本卷七、八相当于四库本卷六；且弘治本卷九、一〇附录二卷四库本不收。（详前）

弘治本卷六《与侄南隐等赓和》诗一首以及卷八《醉太平》词一首，不见于四库本；弘治本卷五《生朝对雪张子善有词为寿》诗在卷尾，而四库本在《郭外翁》（弘治本卷第五

一首诗)之前;弘治本卷八词《望江南七首》在卷尾,而四库本在《锦帐春》(弘治本卷八第一首词)之前,且只有四首。除此而外,收录数量以及编排次序并无太大差异。

2、弘治本缺字,四库本有(拟)补

弘治本卷三《六月□日闻王鉴除殿前都虞候孟□□夔路策应大使时制司籍定渔船守江甚急》,两处缺文,四库本作三、枢除。

弘治本卷四《吴子似》“□酒樱桃熟,□□柳树阴”,两处缺文,四库本作载、隈亭。《访古田刘无兢》末句“俱□水心知”,缺字四库本作在,吟稿、六十家本作受。

弘治本卷五《见名园荒废有感》句中“墙东有寒□”,原字缺坏,四库本作士。

弘治本卷六《方孚若真□宅堂前池上作淮南小山题咏者甚多见其诗轴次韵》,缺字四库本作人。《题亡室真像》句中“□□赋悼亡”缺字四库本作归来。《赠洞霄道士》句中“□蚊亭下濯征尘”,□蚊四库本作斩蛟。《题王制机新楼》句中“手拍危栏□星斗”,缺字四库本作拂。《吉州李伯高会判送盐蠟子鱼比海味之珍者未免为鲈鱼动归兴》句中“风味横生海□边”,缺字四库本作峤。

3、四库本可补正弘治本错字:

弘治本卷四《闻严垣叔入朝再用前韵》,垣字四库本作坦。按:严粲,字坦叔,为戴复古诗友,此处弘治本误,当以坦为是。

弘治本卷六《再赋惜别呈李实天运使》,天,四库本作夫,吟稿本同。按:李华,字实夫,见同书卷二《归后遗书问讯李敷文》题注,当以“夫”为正。

4、四库本多避讳改字:

弘治本与四库本异文,有不少是四库馆臣讳改造成的,诸如“来伐胡”作“方开边”,“胡虏”作“勅敌”、“今古”,“今虏既亡后”作“一自金源灭”,“胡骑”作“戎马”,“虏横”作“边衅”,“鞞使”作“信使”,“胡马”作“铁骑”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经过全部文字比勘,我们推测四库本的底本很可能是明弘治本的传抄本,其个别脱漏错序现象是原本残损所致,而分卷为六则是传抄者或递藏者所作改动。而后来收入《四库全书》时,馆臣又在文字上作过一番全面校勘及讳改,所以显得与弘治本有些差异,但实际上仍然不出弘治本系统。

三、弘治本与吟稿本、名贤本、六十家本、群贤本

1、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计有22首诗可补弘治本之遗。弘治本为全集,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为选本,编卷、收诗数量及序次显然不同,详前。其中吟稿本有12首佚诗不见于弘治本,分别是:《楼上观山》、《林下得月以木阴蔽遮为恨》、《越上青店候别杨休文》、《溪上》、《宝觉僧房》、《豫章东湖》、《山村》、《白鹤观》、《岳市胜业寺禹柏》、《南剑溪上》、《别严沧浪羽》、《闻机上妇说蚕事之辛勤织未成缣往往取偿债家》;名贤、六十家、群贤本则有15首佚诗不见于弘治本,除5首已见吟稿本外,另外10首是:《怀家三首》、《家中作》、《山村》(按:与吟稿本同题异文)、《衡阳舟中》、《村景》、《溪上》(按:与吟稿本同题异文)、《题尹惟晓芙蓉翠羽图》、《庐山马上》。且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多为戴复古同时人所选,可靠程度甚高。

2、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诗题与弘治本异者,往往可以补正弘治本:

弘治本卷一《毗陵太平寺画水呈王君保使君》与《毗陵天庆观画龙自题姑苏羽士李怀仁醉笔诗呈王君保寺丞使君》两首诗分列两处,而名贤、六十家、群贤本总作《毗陵呈王君保使君二首》,且于诗末分别注曰:“右太平寺画水”、“右天庆观画龙自题姑苏羽士李怀仁醉笔”。当以名贤、六十家、群贤本编排更为合理。又《送来宾宰》,名贤、六十家、群贤本题作《送李来宾》。弘治本指明身份,名贤、六十家、群贤本则点出姓氏。

弘治本卷二《立春后二首》，吟稿本录其一，题作《立春后呈赵懒庵》，点明了此诗为谁而作。

弘治本卷四《世事》，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皆题作《三山宗院赵用父问近诗，因举“今古一凭栏，夕阳山外山”两句，未得对。用父以“利名双转毂”对上句，刘叔安以“浮世梦中梦”对下句，遂足成篇。和者颇多，仆终未惬意。都下会李好谦、王深道、范鸣道，相与谈诗，仆举此话，鸣道以“春水渡旁渡”为对，当时未觉此语为奇。江东夏潦无行路，逐处打渡而行，溧水界上一渡复一渡，时夕阳在山，分明写出此一联诗景，恨不得与鸣道共赏之》，文极长，但却道出了戴诗中“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这一脍炙人口的名联产生的经过，以及他最终择定此对的个中缘由。又《舟中小酌》，名贤、六十家、群贤本作《舟中九日》。《自漳州回泉南主仆俱病》，名贤、六十家、群贤本末尾尚有“遣怀”二字。

弘治本卷五《梦与赵用父王子文陈叔方相会甚款》，名贤、六十家、群贤本题作《一夕梦与邵武守赵用父邵武宰王子文浦城宰陈叔方相会甚款诗以记之》，点明了与会三人的身份。

弘治本卷六《李计使领客游白云景泰》题下有注曰：“一作李漕实夫携仆游观海上诸山回途至浦洞乃郑安期得仙之地”，而吟稿本题文正如此，显得更为具体。又《去年访曾幼卿通判携歌舞者同游凤山仆有歌舞不容人不醉樽前方见董娇娆之句今岁到凤山又辟西隅筑堤种柳新作数亭且欲建藏书阁后堂佳丽皆屏去之矣仆嘉其志又有数语并录之（二首）》，吟稿本因仅录其一，为“去年”旧作，而不涉及“新作数语”，故题只作《曾幼卿携歌舞者游凤山》。

弘治本卷七《赣州上清道院呈赵雪篷》，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赵字皆作姚。按：“姚雪篷”，本集中屡屡道及，如卷六《怀雪篷姚希声使君》，即曾为戴复古编选《第四稿》下卷的姚镛，字希声，号雪篷，故弘治本误。又《到西昌呈宋愿父伯仲黄子鲁诸丈二首》，名贤、六十家、群贤本录其一，题作《到南昌呈宋愿父伯仲》。按：西昌，北宋时设镇，在四川，南宋时已废，故当以南昌为是。

3、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与弘治本异文者却常常彼此相同，例：

弘治本卷一《章泉二老歌》耆、口、公、生，名贤、六十家、群贤本作期、师、翁、心。《观陆士龙作顾彦先妇答夫二首有感韵》韵、仁、何足愁，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作次韵、辰、悉足悲。《杜甫祠》诛，名贤本作咏；十、知，名贤、六十家、群贤本作千、如。卷五《金山》深、戍铁，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并作声、载华等等，不胜枚举。

4、弘治本原校一作××，而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异文正作××者，例：

弘治本卷六《抚州谢楼宗丞见访》末句“归去原校：一作只合沧江原校：一作洲理钓蓑”，吟稿本正作“只合沧洲”。《登快阁黄明父强使和山谷先生留题之韵》“宇宙无边万山立原校：一作古今如斯一水在”，吟稿本异文正同原校；“飞来一鹤天相近原校：一作旁罗万象山如立”，吟稿本作“旁罗万象山如画”。又《处世》“直到原校：一作道始终无悔吝”，吟稿本即作道。

弘治本卷七《李敷文酌别席上口占》“樽前今夜苦原校：一作若为情”，名贤、六十家、群贤本正作若。

5、弘治本缺注，吟稿本可补者：

弘治本卷六《清凉寺有怀真翰林运使之来》末句“留取云梢待风来”，吟稿本来下有注曰：“音离”。又《咏梅投所知》，吟稿本题下有注：“留积之水林中作”，道出作诗背景。

6、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有时与弘治本原注同，但俱无弘治本原校，例：

弘治本卷一《松江舟中四首荷叶浦时有不测末句故及之》其一诗末原校：“行一作有”，名贤、六十家、群贤本无。

弘治本卷二《秋怀》“到”原校：“一作对”，吟稿本无。

弘治本卷四《吴门访旧》题注：“孟艮夫侍郎有藏春园”，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

本有题注，良字作“良”。

弘治本卷五《东轩》题注：“喜鹊飞花即景”，吟稿本无。

弘治本卷六《庐山》题注：“十首取其四”，吟稿本录其二、其四，无题注；而其二末注：“太平宫朱陵阁观山”，吟稿本则予以保留。又《咏梅投所知》末原校：“炯一作烂”，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皆无。

弘治本卷七《周子益年八十赴殿》题注：“所居榜曰渔村”，名贤、六十家、群贤本无。等等。

可见原本注文有作者自注与选者原注之别，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对自注基本予以保留，有时也有脱漏，但一概无编选者之注。至于弘治本原校当是出于明马金等人之手，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作为宋人选宋诗，肯定是不会出现这些校记文字的。

综上所述，明弘治本十卷是传今最早且收诗最全的本子，为戴鏞所辑、马金所编校，由宋鉴刊刻于庐州郡斋。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及清嘉庆宋士萃《台州丛书》本均祖弘治本，明淡生堂抄本忠实地保留了弘治本原貌，而《台州丛书》本又新作了校勘。明潘刻本六卷是潘是仁重新编校的新选本，尽管质量一般，但于弘治本系统之外相对独立；因其缺字及异文又多同弘治本，故又并非毫无干系。清四库本六卷，虽然卷数与弘治本不合而与潘刻本相同，但经全面文字比勘，发现该本实出于弘治本而完全不同于潘刻本。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皆为宋人所选编，名贤、六十家、群贤本实是同一种选集的不同版本；此数本在文字上常常可以补正弘治本，而且还保留了弘治本失收的大量集外佚诗（去其重复，共得 22 首），故显得弥足珍贵。所以今天我们整理点校《全宋诗·戴复古诗》，自当以弘治本为底本，参校其他有代表性的本子潘刻本、四库本、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等数种，然后利用吟稿、名贤、六十家、群贤本以及他书材料进行戴诗补遗。至于明淡生堂抄本、《台州丛书》本，因完全出自弘治本，故可略而不校。

另外，《戴复古诗集》，今人又有重新整理的本子，由金芝山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8 月出版，收在《两浙作家文丛》中。此本以《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弘治本为底本，参校了四库本、台州丛书本、《两宋名贤小集》、《南宋群贤小集》、《南宋六十家集》、《宋诗抄》、《石屏词》等多本。对底本作有调整，首有金芝山撰于 1988 年春的《前言》；戴复古诗词止于卷八；后为《戴复古诗集抄补》，即从《宋诗抄》等书中所辑补遗诗 15 首、词 16 首；而将底本卷首东臯子诗以及卷九、卷一〇戴东野等人诗，移作附录一；又将传记、书考、序跋、题咏、诗评等相关材料汇集一处作为附录二，使得编次较原本更为合理，且在戴集补遗以及传记生平、文集编刻流传、前人评述等材料的搜集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实用的本子。不过确也发现其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说此本未将明潘是仁刻本列入参校，据其书后附录《台州府志·经籍考》“明潘是仁《宋元名家诗集》中有《石屏集》六卷。今四库据鲍士恭藏本著录凡六卷，盖即《宋元名家集》本也”来看，大概点校者也认同此说，但实际上潘刻本完全不同于四库本，而相反台州丛书本是清嘉庆宋世萃据明弘治本重刻的，却列入主要参校本，所以顾此失彼，有失允当。再来看《戴复古诗集抄补》，其中《思家》、《游九锁》摘自《宋诗抄》，其实二诗最早的出处当为本集卷首宋赵蕃《题跋》、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五（题作洞霄宫）。其余《白鹤观》等 13 首佚诗，书中出处作“以上录自《南宋群贤小集》”，实际是指《南宋群贤小集》所收的《石屏续集》，而不是《中兴群公吟稿戊集》，这些佚诗又见《两宋名贤小集》和《南宋六十家小集》。而且我们前面已经查考清楚见于《石屏续集》以及《中兴群公吟稿戊集》等的集外佚诗，去其重复，共得 22 首，此本遗漏 9 首，当是未见《中兴群公吟稿戊集》所致，故戴复古诗的补遗应该重新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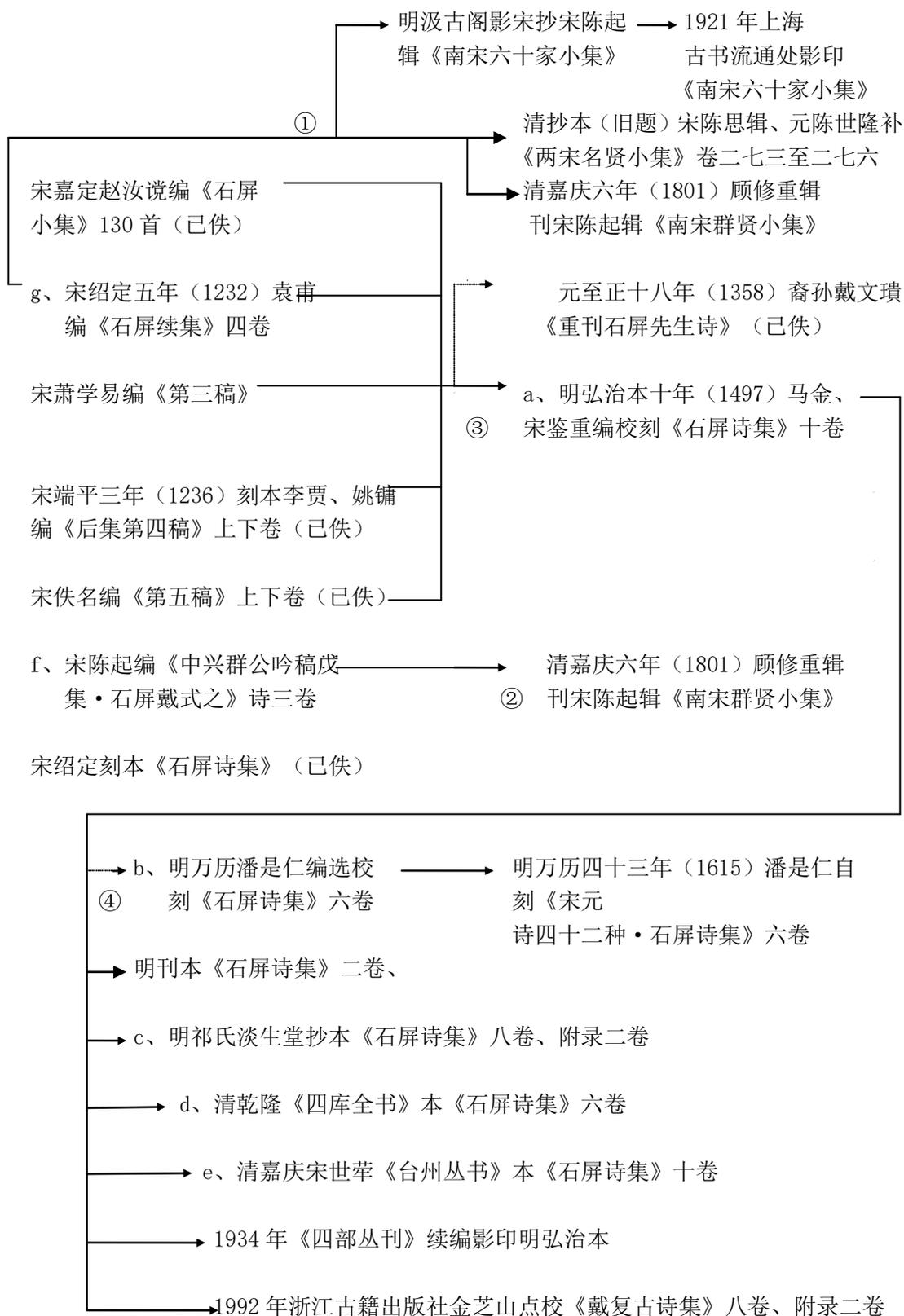
我们整理的《全宋诗·戴复古诗》，便据宋人题跋、《南宋群贤小集·中兴群公吟稿戊集》、《两宋名贤小集·石屏续集》以及《全芳备祖》、《后村千家诗》、《咸淳临安志》、

《永乐大典》、《诗渊》、明正德《南康府志》等等他书材料钩沉稽考，共辑得佚诗 32 首、残句若干，编为卷八，附于底本（弘治本）七卷之后。目前复从《后村千家诗》等书中考辑出 33 首佚诗，将收入《〈全宋诗〉补正》当中。

2008 年 1 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吴茂云校注的《戴复古全集校注》，以《台州丛书》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宋诗抄》、《诗渊》等，吸收了《全宋诗》的辑佚成果，新收佚诗 63 首，新辑佚文 1 篇，收词 46 首，总计作品 1024 首（篇），还考证了作品所涉亲友 300 多人；另有附录三种《东皋子及族人诗词》、《传记、序跋、酬唱、诗评》、《校注者戴复古论文选录》。后吴茂云又与郑伟荣共同校点《戴复古集》，2012 年 8 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二书用力甚勤，不过底本当选明弘治本。

源流图

戴复古诗集历代编刻流传情况已如前所述，概括起来说，现今还有 4 个系统，其中又以明弘治本一支流传最广。下面我们将整个版本源流图示如下：



（原刊《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收入《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日文版《〈戴复古集〉编刻流传攷》载《江湖派研究》第1辑，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江湖派研究班，2009年2月。今增改修订）